

博物

卷之三

人情

首

三

年

一九〇九年正月一日，唐以東、許博智、余秉國生一行，从香港乘輪船到日本。同年四月，他们从日本到北京，游覽了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地，然后乘船到南京，再由南京到上海，最后到杭州，游览了西湖，于六月一日回国。

余秉國游過杭州，是和友人雨在海天俱樂部的下属酒店。雨在海天俱樂部位于南京漢口大東路近田北

字。

雨在

海天

俱樂

部

有

中華

俱樂

部

有

中華

俱樂

部

任事處

有

中華

俱樂

部

有

中華

俱樂

部

有

中華

字。

雨在

海天

俱樂

部

有

中華

俱樂

部

有

中華

俱樂

部

夏

衍

引

中華

俱樂

部

有

中華

俱樂

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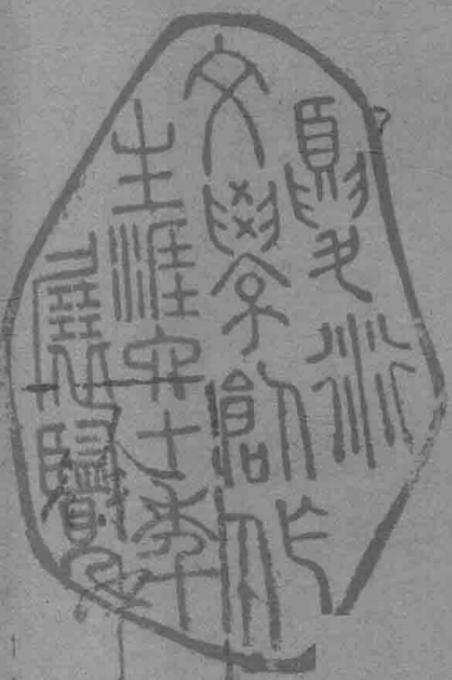
有

中華

首本舊寫本題，即改立換印狀紙已經寄出的日本木盒太冬，從

梦录旧寻懒

序
叙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懒寻旧梦录

著者/夏衍

题签/李一氓

责任编辑/张子敏

装帧/艾雨 马少展

出版/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香港分店: 城多利皇后街9号

发行/新华书店

印刷/北京新华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0.5印张 330,000字

1985年7月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

书号 11002·653 定价 4.00 元

- 夏衍选集
夏衍论创作
夏衍杂文随笔集
电影论文集
夏衍近作集
杂碎集
蜗楼随笔

夏衍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上海文艺出版社
三联书店
中国电影出版社
四川人民出版社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夏衍剧作集

上海屋檐下

夏衍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戏剧春秋

夏衍、于伶、宋之的

夏衍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憩园

(改编电影剧本)

夏衍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革命家庭

(改编电影剧本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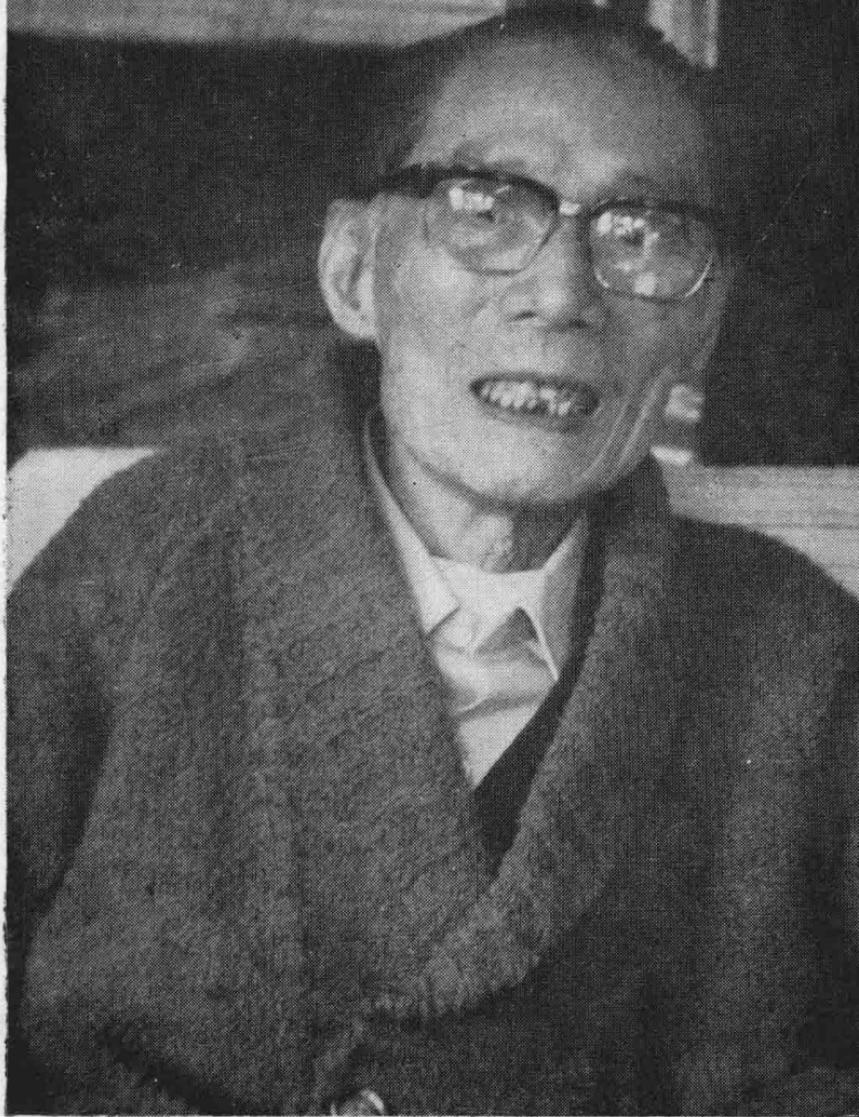
夏衍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夏衍研究资料

夏衍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作 者 近 影

母亲



在日本求学时



与明治工业专门学校同学合影

一九三八年在广州

前排左起：茅盾、

夏衍、廖承志

后排左起：潘汉年、

汪馥泉、郁风、

叶文津、司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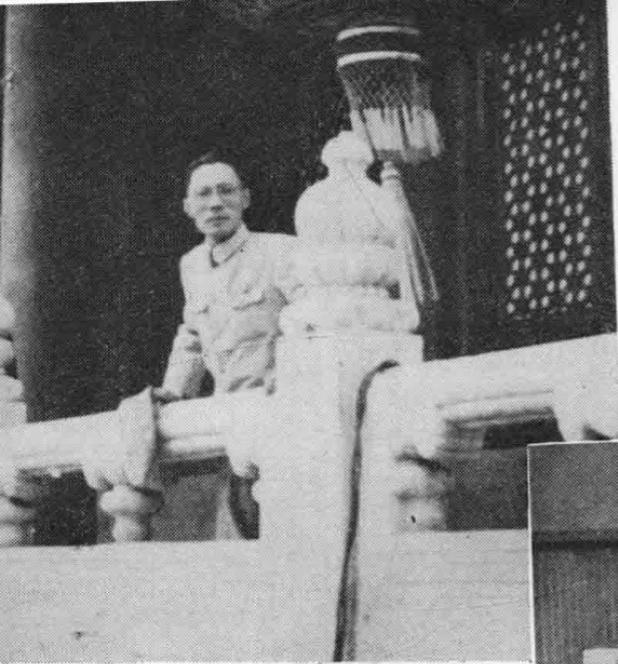
慧敏



一九四七年在香港

左起：陈歌辛、瞿白音、夏衍、丁聪、何香凝、洪道、廖梦醒、欧阳予倩

一九四九年十月一
日开国大典之日摄
于天安门城楼



与日本作家井上靖合影
(一九八四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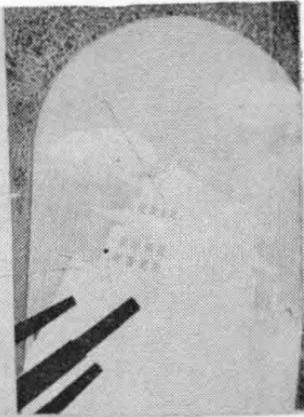
在北京寓所

影书译著部分作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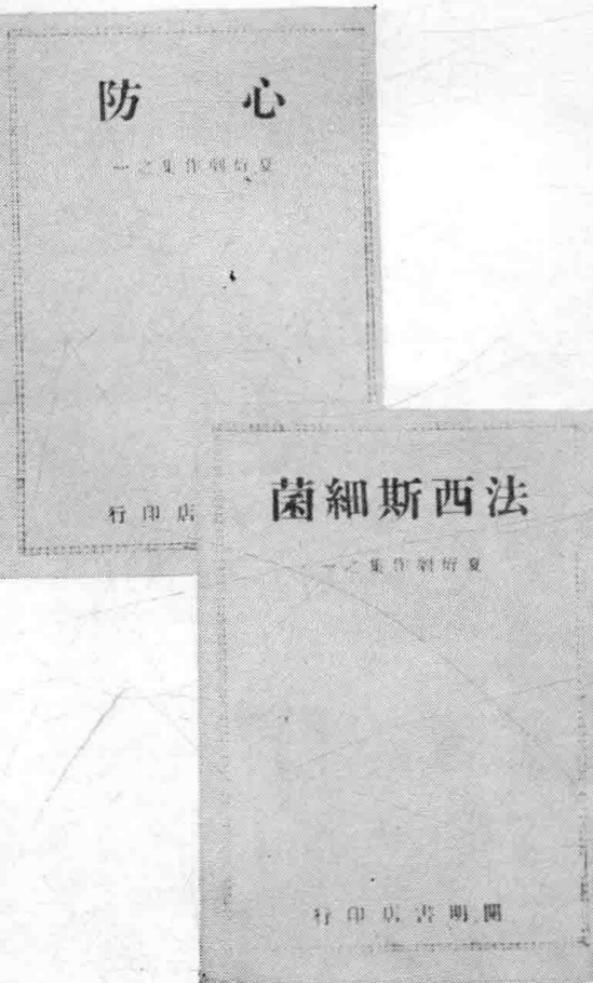
賽金花

夏衍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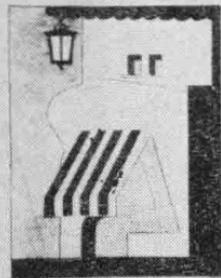
心防

夏衍著



上 海 屋 豈 工

夏衍著



長途

野草集序 第之一

夏衍



上海书店著者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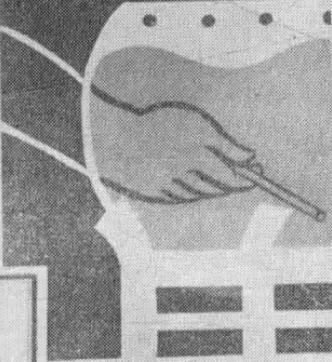
蝶戀隨筆

夏衍



著者夏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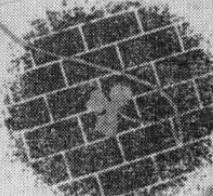
鼓邊集



上海出版社編

文華出版社

野草



《野草》——与宋云彬、聂绀弩、
孟超、秦似合编的杂文刊物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獻集成

本刊為
國慶特刊敬事

上：《救亡日報》
下：《建國日報》
(保存下來的一張清樣)



始信人間有鐵軍
張向華將軍會見記
夏衍



(以上著译和日报，由唐弢、姜德明、范用、顾家干、社科院中国文学研究所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、三联书店提供原版本)

“农士自白”中所收，即
此序

自序

上了年纪，常常会想起过去的往事，这也许是人之常情。

六十岁以前，偶然碰到中学或大学时期的同学，或者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，也不免会回想起青少年时期的事情，但除了一九三九年写过一篇《旧家的火葬》之外，从来没有写过回忆往事的文章，这主要是我很同意乔冠华的意见：写文章尽可能“少谈自己”。

我认真地回忆过去，是在一九六六年冬被“监护”之后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，“专案组”的头目责令我在一星期之内，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起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止的“自传体的交代”，我如期写了三万多字，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，就被叫去“问话”，那个穿军装的头目拍着桌子怒吼：“不行，得重新写过，要你写检讨，不准你替自己树碑立传。”我记得这样的“交代”前后写过三、四次，后来才懂得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，一是要从“交代”中找到“外调”的线索，其次是想从

前后所写的“交代”中找出一些不一致的地方，作为继续逼供的突破口。这是一种恶作剧，但这也逼使我比较系统地回忆了过去走过来的足迹。

在这之前，我从来不失眠，也很少做梦；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，一入睡就会做梦，奇怪的是梦见的都是童年时期的旧事，梦见我的母亲，我的姊姊，梦见和我一起在后园捉金龟子的赤脚朋友。每次梦醒之后，总使我感到惊奇，事隔半个多世纪，为什么梦境中的人、事、细节，竟会那样的清晰，那样的详细！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开杭州，久矣乎听不到故乡的乡音了，而梦境中听到的，却是纯粹的杭州上城口音。

当时写“交代”，目的是为了对付专案组的逼供，所以写的只是简单的梗概。那时批斗猛烈，审讯频繁，既不敢说真话，也不能说假话，因为说真话会触怒“革命派”，说假话会株连亲友。全国解放后，我经历过许多次“运动”，可以说已经有了一点“斗争经验”，所以我力求保持清醒，我的对策是宁可写违心的检讨，不暴露真实的思想。

真正能静下心来追寻一下半个多世纪走过来的足迹，反思一下自己所作所为的是非功过，那是在一九七一年“林彪事件”之后。从一九七三年三月到一九七五年七月，我有了两年多的独房静思的机会，不是说“吃

一堑，长一智”么，我就利用这一“安静”的时期，对我前半生的历史，进行了初步的回顾。这象是一团乱麻，要把它解开和理顺，是不容易的，要对做过的每一件事，写过的每一篇文章，分辨出是非曲直，那就更困难了。任何人都有主观，任何人都会不自觉地替自己辩护，一九六六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，“革命小将”用鞭子逼着我唱那首“我有罪、我有罪”的歌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，可是经过了两年多的“游斗”、拳打脚踢、无休止的疲劳审讯，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是，真的是应该“低头认罪”了，这不单是对淫威的屈服，也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压力，这就是对无上权威的迷信。

从“交通干校”转移到“秦城监狱”之后，获得了很大的恩典，准许看书了，准许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。这时我的右眼已近失明，牢房里光照时间很短，我就利用上午光线较好的时间，选读了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关哲学和经济学的篇章。在秦城读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不受干扰，可以边读边想，边联系中国的实际。历史唯物主义、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应该说过去已经读过不止一遍了，而这时候读，边读边联系过去几十年间的实际，才觉得“渐入佳境”，别有一番滋味了。

可惜这一段“独房静思”的时间太短了，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清晨，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：“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”，即日解除“监护”。我感到意外，但我还是冷静地对那个专案组的小头目说：“关了八年半，批斗了几年，要解除监护，得给我一个审查的结论”，对方蛮横地回答说：结论还没有，但可以告诉你，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。这时，和专案组一起来的对外文委的项明同志对我说，已经通知了你的家属，都在等着你，先回去吧，于是我就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。

和阔别了多年的家人团聚，当然是高兴的，但在当时，大地上的黑云还没有消散，审查还没有结论，“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”，这表明我当时的身份依旧是“从宽处理”的“敌人”。监护是解除了，但“监视”则一直没有解除，我家门口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视，后来有人告诉我，有一个四十年代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，还向专案组和于会泳的文化部打过关于我的“小报告”。但我还是在压城的夜气中望到了光明，在炎凉的世态中感到了友情的温暖，在我回家的几天之后，首先来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，承志的乐观，一氓的安详，给了我无穷的勇气。廖用两手按住我的肩膀，笑着说：居然还活着，这就好！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。